



圖書館與出版事業的完美融合

讀《商務印書館：中國圖書館發展的推手》

顧敏 ◎ 國家圖書館館長



商務印書館：中國圖書館發展的推手

蔡佩玲著/臺灣商務/9809
434頁/22公分/400元/精裝
ISBN 9789570524048/487

◆ 緣起—商務印書館小檔案

商務印書館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成就與貢獻，是無庸置疑的。它的發展觸角除了一般我們熟知的出版事業之外，對於其他文化事業的發展，也是近年來許多研究商務印書館早年歷史的學者，爭相探究的對象。研究者經由不同的視角觀察，檢視商務印書館諸多豐碩且開風氣之先的成就，更能展現出商務印書館，此一崛起於民間的平凡小出版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西方文明劇烈衝擊與交融再生的風雲際會年代，竟造就出如此多元文化價值的可貴與不易。

近期本館同仁蔡佩玲著《商務印書館：中國圖書館發展的推手》，即是由圖書館史的觀點，透過對商務印書館自1897年創立以來的發展歷史，來探討它以一個出版社起家的角色，與中國近代由傳統藏書樓到新式圖書館事業發展，兩者間的綿密關聯。當時的公共圖書館運動與全民社會運動提供了自學

教育和意識覺醒的素養機會，圖書館運動更與啓迪民智直接相關，在那個大時代的背景之下，商務印書館的先賢們，的確做了一些民族文化新教育的千秋大事。

◆ 由涵芬樓到東方圖書館

本書是近年來對商務印書館的諸多研究中，唯一專注於探討商務印書館在圖書館事業的歷程、內涵、成果與影響的專書。全書共分為五個章節，依其脈絡首章以宏觀視野介紹中國近代圖書館的發展概況，其次介紹商務印書館初期建立與發展與歷史，接下來專章介紹商務印書館最先成立的藏書樓——「涵芬樓」如何扮演著由傳統藏書樓過渡到近代新式圖書館的歷程，接續則專章介紹「東方圖書館」的發展歷史，最後介紹在商務印書館主持下的東方圖書館對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貢獻與成就，因此被譽稱為「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的推手」及「現代化圖書館典範」。

追溯商務印書館與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關聯，原先僅是商務印書館早年為提供內部職工編輯書刊參考用的「編譯所圖書室」，演變成為以保存國家文化為使命，致

力於蒐藏由藏書家散出古籍與地方志的「涵芬樓」，再進一步擴充成為當時全國最大規模的公共圖書館——「東方圖書館」。這些看似屬於商務印書館內部的發展遞嬗，恰與清朝末年以來，從傳統藏書樓到新式圖書館的發展軌跡相互驗證；而商務印書館在圖書館事業的成就，又成為此一時期發展軌跡具體實踐的最佳範例，例如「四角號碼排序法」、「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等。但就另一層面而言，中國近代圖書館史發展的諸多內涵與成就，又何嘗不是商務印書館在此一時代擔任重要推手，所造就所激盪而來的！

◆ 商務印書館與圖書館事業

商務印書館在經營圖書館時所採行的諸多作法與規範，如開放供眾閱覽、採購兼顧文化保存及一般民眾所需之中外圖籍、推動並參與圖書館專業人員養成教育、採行新式圖書館管理制度（書刊開架制度、書刊流通服務、巡迴文庫等）、改善館藏資源組織效益（訂定新式圖書分類法、索引檢字法、新式著者號等）、參與圖書館專業團體、出版圖書館學相關專書與研究論著等，均與中國新式圖書館的發展軌跡脈脈相連，並多所互勵互助，大有興起掃除百年積習，潛化中華文藝復興，再造並駕新文明之勢。商務印書館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貢獻，首先需提及的是他對「推動圖書館學理論與實務」的貢獻。

商務印書館之所以能稱之為「中國近代圖書館的推手」，此誠如本書著者所歸納探討，主要在於它「推動圖書館學理論與實務」及編印發行「圖書館重要館藏來源」這兩方面貢獻。前者包括「出版圖書館學專業

論著」、「訂定館藏組織管理規範」、「培育圖書館專業人才」及「製作圖書館用品與展覽」四項。

其中我特別要提出來的是「訂定館藏組織管理規範」這一項。當時在商務印書館主事者王雲五先生的研發下，他發明訂定了「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中外著者統一排列法」及「四角號碼檢字法」三項與圖書館館藏組織有關的制度。這三項制度當時主要用於東方圖書館未開放前，作為整理東方圖書館數量龐大、多語文且多類型館藏之用。當時王先生的睿智卓見，已看出一個成功的圖書館經營與服務，將所有館藏予以妥善的組織與管理，為首要任務。「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用於將中外文館藏透過統一的分類法合併於一處，他將當時國外流行的「杜威十進分類法」予以改善而成。讓讀者即類以求書，能完整掌握中外文同類別館藏內容之全貌；「中外著者統一排列法」將中外著者透過統一的編號制度來編訂著者號，這也能將中外文圖書組織於一處。

另由一本電碼書開始構想而成功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更是王先生很重視的人生成就之一。當時研究中文檢字法的學者雖然很多，但尚未有具體的成就。四角號碼檢字法在運用上，不但作為東方圖書館排列書名、著者、類別、譯者、叢書等三十餘萬張各式卡片時的依循，同時也用於商務印書館發行的諸多參考工具書如字典、辭典上，甚至將中國以音韻排序的《佩文韻府》以四角號碼檢字法重新排序發行，結果大大的提升了該項古書的使用效益。上述三項制度不但深刻的影響當時諸多圖書館採用，許多參考工具



書的編印發行，也均依循不悖。探析這些制度之所以能如此全面的影響當時的圖書館界、出版業界，甚至政府機關，獲致他們的肯定與大量採行，蔚為風潮，這與王雲五先生廓然大公放棄發明著作權利益，並透過商務印書館強大的企業實力及廣大的出版品流通網絡等諸多途徑，積極安排各種推廣教育活動有關。甚至商務印書館正式遷臺成立臺灣商務印館後，至民國六七十年的數十年間，許多臺灣地區的圖書館仍持續採行這些當年發明的館藏組織制度。且許多學術機構或出版單位所編印的重量級參考工具書，也仍然依循「四角號碼檢字法」來作為書後索引的編製方式。這三項與中國近代圖書館經營與工具書出版密切相關的制度，均是因商務印書館而興起、發展及存在。

撫今遙想，當年若不是上海淞滬之役的無情戰火摧殘，以及後來一連串無奈、混亂的時局干擾，以商務印書館開創以來諸君子在滬上的自強不息，以其耕耘數十年既有之輝煌成就與發展的企圖心，則中國近代的圖書館事業發展，甚至近代的文化史、教育史及出版史等各方面，絕對另有一番不同的卓然機會與成就。

商務印書館在半個世紀歲月中的各時期藏書樓或圖書館，均經營非常成功，甚至成為當時同期其他藏書單位或圖書館爭相仿效的典範，也是諸多學者或藏書家登樓拜觀的訪書聖地。探究其成功的原因很多，但前後期主事者——張元濟及王雲五兩位先生的浩然遠見與無私胸襟，絕對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他們兩人均以豐富的學識為基礎，不拘泥於舊思維、舊作法，而能與時俱進，在引

進西方與日本等國家的圖書館管理新知的同時，更融通中國傳統藏書樓的經營特色，自創出融貫中西的新式管理制度；對於這些新制度與新規範，運用商務印書館廣大的行銷通路，透過全民教育的方式，不藏私的大加推廣，甚至自行出資辦理相關研習課程，並贊助來自各地的圖書館研習學員。

◆ 出版V.S.圖書館：攜手合作·相輔相成

誠如本書作者的探討，圖書館是文化界中與出版界關係最密切的機構之一。發生於民國初年的新圖書館運動與當時的出版業兩者間，互有「水幫魚」與「魚幫水」的依存關係。綜合而言，圖書館採購圖書為出版業的重要客戶，有助於擴大圖書市場的營業額；圖書館同時也成為出版業發行成果的展示櫥窗；圖書館為出版業造就廣泛的讀者群，因此也為出版業開闢更廣大的消費市場。此外，出版業在組織出版及選題方面也需納入圖書館需求方向的考量，故圖書館事業與出版事業關係的確非常密切。

商務印書館於民國初年位居中國近代出版行業的龍頭地位，其豐富多元的出版成果，成為近代許多圖書館的館藏基礎。依據商務印書館內部資料統計，自光緒28年—民國39年（1902—1950）間該館發行的圖書數量高達11,556種，28,058冊，平均每年發行數量高達240餘種585冊以上。商務於民國21年因淞滬之役遭日軍戰火幾乎摧燬所有的廠房與設備，但匆匆數年間勵精圖治隨即復興恢復出版事業。如自次（22）年起所發行的圖書數量已佔當時全國出版圖書數量的45%，隨後幾年的出版數量更超過全國一半以上。故

當時許多圖書館因商務印書館的出版品而得以設置成立，或藉由商務印書館所發行的涵蓋諸多主題，且質優量多的出版品，而得以提升館藏內涵，加強閱覽服務品質。更值得一提的是商務印書館於民國18年編印發行的《萬有文庫》叢書系列，其出版緣由就是為「……想把整個的大規模東方圖書館化身為千萬個小圖書館，使散在於全國各地方、各學校、各機關，甚至許多家庭，以極低的代價，創辦具體而微的圖書館，並使這些圖書館的分類編目及其他管理工作極度簡單化。……」當時發行的《萬有文庫》每冊書上均印製有分類號及著者號，分類號依「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編碼，著者號依「四角號碼檢字法」編碼，兩組號碼，均印於書脊上。隨書另備有書名的印刷目錄卡（Printed Catalog Card），這是我國首次有購書且隨書附送印刷式編目卡片的做法。這項創舉不但使《萬有文庫》成為當時的暢銷書，當年因購置該套文庫，藉此而成立的圖書館在二千家以上，這具體展現了出版事業與圖書館事業緊密關連的依互關係。當年《萬有文庫》的做法，恰是現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制度的雛型，此不禁要為當年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的睿智與遠見而讚嘆。

◆ 展 望

儘管21世紀的圖書館面貌，已遠不同於上一世紀初商務印書館成立當時的圖書館事業。然商務印書館以一人出版單位，卻能成為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重要推手，廣受各方肯定與推崇，鑑古知今，對於現今持續朝數位化發展的圖書資訊界及出版界，仍有值得參考與省思的面向。圖書館所具有的廣泛社會教育功能與知識管理領航的專業，在

進入21世紀的數位3D時代，依然汲汲如故。

去年以來席捲全世界的金融危機與經濟風暴，導致多項企業、產業面臨崩析邊緣的掙扎，其中文化出版業更受影響。近期國內民意代表為活絡國內出版市場，擴展商機，主動召集政府主管機關、國家圖書館等相關圖書館單位及出版業界代表等共同舉辦座談會。討論議題有「如何在政策面協助出版業界？」、「圖書館現行採購圖書價格如何訂定？標準為何？政府採購圖書標準為何？如何處理公共租借權問題？」、「如何運用圖書館現行之圖書採購制度加強購買年度優良出版品，以活絡出版市場，達到鼓勵出版社出版優質好書之目的。」及「為增加民眾閱讀優質書刊之興趣，圖書館可否設置優良出版品推介專區，以營造優質閱讀環境。」等四項，各項議題均展現了出版業界及圖書館界兩者具有一定程度的依存關係。這也再次驗證了上世紀的商務印書館，它同時經營出版事業及圖書館事業，之所以能獲致成功的必然性。

時至今日，國家圖書館仍將持續提供全國出版事業諸多服務，如國際標準書號（ISBN）的編配、線上即時新書出版通報、辦理各項主題書展、編製主題精選書目等；而全國出版業界也發行更多的優質佳籍，建構圖書館館藏根基，以發揮提供民眾終身學習與資訊領航的價值。面對數位時代越來越多電子書出版，國家圖書館也在政府主管機關的指導下，積極與國內數位出版業界共同規畫國家型的電子書典藏計畫。

讓我們一起攜手，早日邁入數位學習、數位閱讀與數位圖書館服務的新紀元，共創榮景佳績。